

■ 新作聚焦

熊育群长篇纪实文学《钟南山:苍生在上》:

■ 创作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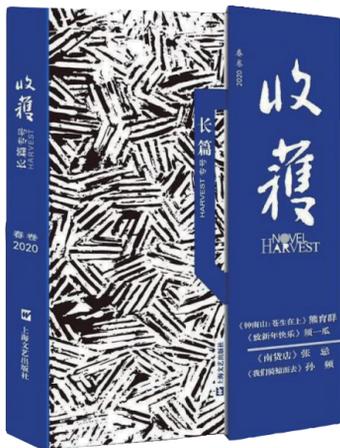
文学如何面对国家民族的命运

□ 潘凯雄

《收获》当然是全国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之一,新时期以来很多重要的文学思潮都是由《收获》刊出的作品所引发,这是一段客观的历史存在。在我的阅读记忆中,《收获》有许多标志性的首发,而这次在“长篇



有人生命运的波澜起伏,有人物内心的跌宕碰撞,有外在行为逻辑的呼应,人物就立了起来。《钟南山:苍生在上》中呈现出来的钟南山,不仅仅是在电视上出现在公众眼前的那个帅老头,而且是一个立体的、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可亲可敬的“这一个”。



个环节。毕竟这是人物的内心而非外在的行为,分寸把握不当,就很容易陷入虚假造作的圈套。我们在电视中看到钟南山一次次地告知公众:非典也好、新冠也罢,都存在着人传人的巨大风险时,态度是坚毅的,殊不知这背后他内心也有纠结与矛盾。我们在电视中看到钟南山在谈到李文亮、说到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时眼中闪烁的泪花,殊不知他内心的那种百感交集……在《钟南山:苍生在上》中,熊育群抓住这些面上的细节而进入了人物的内心:焦虑也好、纠结也罢,痛苦也好、欢乐也罢,在这些既需要回应又难度不小的环节,作品对逻辑尺度和分寸的把握都是十分得体的。

有人生命运的波澜起伏,有人物内心的跌宕碰撞,有外在行为逻辑的呼应,人物就立了起来。所以,《钟南山:苍生在上》中呈现出来的钟南山,不仅仅是在电视上出现在公众眼前的那个帅老头,而且是一个立体的、丰富的、有血有肉的、可亲可敬的“这一个”。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在我看来,这个第一次就是《收获》发出了一个鲜明的信号:那就是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节点,文学不能缺席,不仅要到场,而且要高质量的在场。所谓高质量在场意味着不只是近距离地参与、去触摸,而且还要高质量地去呈现。如果说前者还只是一种态度宣示的话,那么是否高质量,能否产生影响力,则取决于文学的专业化程度如何。专业化程度越高,彰显出的力量就越强。而熊育群的长篇纪实文学《钟南山:苍生在上》至少是现阶段我读到的最好的有关抗疫题材的文学作品之一。

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强大的感染力,在我看来,至少有如下两点成功的经验值得关注与重视。

首先,是媒介与作者间成功的双向互动。《收获》第一时间主动组稿,这当然只是一个职业动作,没什么特别值得稀罕,但选择表现对象和谁来操刀却很重要。早在17年前非典肆虐时钟南山已然成为一位社会公众人物,而这次新冠的袭来更使得这个人物不再是一个纯粹单一的医者,而是集多种符号于一身:医者良心、医者仁心、公信力、专业性……“盘活”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就是全方位呈现这次全民抗疫的一扇绝佳窗口。谁来“盘”?而且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熊育群的胜出虽不能言非他莫属,但确有其独特的优势:早在17年前非典流行时,在媒体工作的熊育群就采访过钟南山,此后在钟南山成为全国道德模范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重要节点,熊育群都写过有关他的专题,彼此已建立起良好的信任,这就为之获得第一手可靠的素材创造了便利。此外,尽管熊育群平日创作以散文和长篇小说为主,但总体上都是偏叙事、偏人物,有了这样的基础,转入以人物与事件为中心的非虚构写作当不会存在难以跨越的艺术沟壑。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作者与《收获》杂志始终保持着高频度的双向互动,据熊育群披露,作品的修改过程甚至比创作更艰难。这种目标一致、交流和谐,显然是这部作品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

其次,既然是文学作品,决定其感染力如何的根本因素就必然在于作品自身在艺术表现上的力量。具体到这部作品而言,如下两点格外突出。

一是出现在这部作品中的钟南山充满了命运感。

人们过去有关钟南山相关信息的获取不是来自纸媒就是从电视上遥望,因而基本上是一个平面的、片段的、比较单一的形象。但熊育群笔下的钟南山则是由一段完整的人生而呈现的,这个过程有跌宕、有起伏,因而充满了完整的命运感。我们以往只知道钟南山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呼吸科专家、敢说真话的大夫,殊不知,这位专家的成长也充满了坎坷与崎岖。刚从大学步入社会即遭遇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专业根本无从谈起,甜蜜的爱情尚未结出硕果又面临两地分居的尴尬,47岁好不容易获得赴英国深造的机会,又遭遇某些同行的冷眼与歧视……原来,在钟南山今天的形象背后也曾经历过种种挫折与艰难。

写出人物的命运,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写作最基本也是颇有难度的一个环节,而《钟南山:苍生在上》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就得益于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命运,作品中钟南山遭遇的人生起伏,奔着一个目标不屈不挠的态度,决定了他这一生的走向。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和我一样,以往我们所知道的钟南山,就是一个尊重科学、直面现实的好医生,但是从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他的人生充满了曲折与颠簸,如果这不是一种坚定的意志和力量在支撑,就不会有今天的钟南山。

二是作品在呈现钟南山刚毅果敢一面的同时,也不放过他内心犹疑与冲突的纠结。写出人物的内心既是写活一个人物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难以把持的一

“2020年1月18日,现代速度的高铁刺穿凛冽的夜色,向着疫情正在失去控制的‘震中’武汉呼啸而去。”长篇非虚构《钟南山:苍生在上》,就从钟南山登上驰往武汉的高铁写起。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地球按下了暂停键。在这场世界性的灾难面前,中国记住了一位耄耋老人,那一夜,他奔赴疫情“震中”,匆匆的行色、困倦时凝重的表情、危急关头的果敢与担当……都令世人印象深刻。

选择写钟南山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活儿。首先,一个与现实零距离的题材,如何让文学性不被坚硬的现实埋没,让艺术在接近纷纭社会时不至于窒息?其次,写一个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物非常冒险。因为无论如何努力,作品中的人和真实的钟南山依然有距离。一是受条件拘泥,不能放开写。譬如一些特定时期,钟南山内心的矛盾、纠葛并不好挖掘。几十年后,或许这些遗憾会有弥补。二是,我们得承认,作者其实写的是他心中的那个人,作家是一个塑造者、创造者,就文学本质而言,真实的人不过是个原型,哪怕非虚构作品也是如此。写成文字的东西没有不是主观的,这不但是个文学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但离人物太近,受真实人物的局限,与真人像不像几乎成了准一的标准和追求。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牺牲了作品的艺术性。三是钟南山是个公众人物,他的事迹人尽皆知,几乎没有虚构的空间。而真实的东西往往会有种种限制。

但作家并非无所作为。写作必须要有一颗飞扬的灵魂。我可以把笔触深入到钟南山的内心世界,从他的精神与情感进行挖掘,并且打破时空,将人物置身于尖锐复杂的背景与宏大的视野中,以文学的力量复原某些重大时刻,记录历史、留下现场,并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

这部作品的写作用了一个月时间,修改却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写作时,我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大都是凌晨两点才上床,写得脑子就像发热的转子,还会胀痛。我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现在用脑久了,还有后遗症。

熬时间只是一个方面,最麻烦的是我写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事情,它时时都在变化之中,就像这次疫情最初暴发,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谁也无法想象!事情有了转变,之前的表述尺度就得修正,新的事实出现了,又得补充,不准确的地方还要修改。我也不想过任何细节,被编辑笑话为“细节控”。写作总有结束的时候,而疫情至今仍未停止,还得采取某种写作策略。这是一种无休无止的折磨,我天天关注新闻、搜寻信息,看到手机都想吐了。

《钟南山:苍生在上》把钟南山放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来写,我也想通过写钟南山把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历程写出来。毕竟这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事件。但这是写人物,有传记写作的特点,我想把他的一生呈现出来,当然是有重点、有选择的。只有把他的人生写透了,才能写出钟南山为何敢医敢言,才能理解他的性情、胸怀和作为。

非典、新冠肺炎这两次疫情都在钟南山年事已高的时候出现,都如此凶险。竟然都是他一次又一次出征。看到他84岁还如此操劳,这个事情本身就值得反思。相比疫情,17年之间,到底我们哪些进步了,哪些依然如故,重复着类似的剧情、发生着同样的悲剧?谁能保证若干年后,这样的剧情不再上演?如果没有钟南山,我们是否能够做得更好?

钟南山的一生充满挫折,这是当初我也未曾想到的。这些挫折他自己也难以忘怀。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上进心、事业心,他走不到今天。强者,大成者,挫折就是人生的阶梯,有挫没有折;寻常人一挫就折,挫折就是他一生的失败,一生也难以走出来的痛苦。命运谁也不能选择,但奋起一定是个人可以主动选择的。

我不造神,也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是一样的,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想把他当普通人来写。但人比人确实有高低,有的人令人高山仰止,有的人唯利是图、蝇营狗苟,正因为如此,钟南山的出现才显得珍贵无比。这样的写作才具有价值。

以文学参与历史,留下现场

□ 熊育群

■ 评论

散文的模样与姿态

——评刘琼散文集《通往查济的路上》 □ 蒋应红

■ 第一感受

《观心宝石》:故事及其关系元素

□ 施战军



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知识报国的理想情怀,以及他们毕业后进入社会、担当大任、建功立业的故事,曾是上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与改革文学汇流交响而奏出的主调。他们后来如何?随着文学思潮的快速演进,我们的阅读期待也被分散开来,直到这批当年的文学人物已经差不多步入老年,我们才从不减当年风采的作家那里,重新去注意和打量这一代人的整体命运。李永生长篇小说《观心宝石》的出现,就是在这个时候为我们展开的那一代人盛满成败、浮沉、苦乐、歌哭的人生长卷。

作品叙事质地非常坚实,人物活动的情境更是非常真切。小说中,设计院的学术条件、人际环境、发展形势,下海经商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与知识分子的向往和习惯相冲突的问题,投身边远艰苦地方教育所进行的身心调适,在知识报国的初心被唤醒、人之为人的意识被擦亮之后,林阳内在的传统儒道文化与现代理念,得到了重生般的整合。因为小说的社会背景那么清晰、时代演化那么确凿、所遇所交的人物那么性格各异,于是,这些故事就那么扣人心弦。

在故事内层,对人性检视力量的有无和深浅,是判别作品优劣的最后依据。在这部以心血和灵悟构建的《观心宝石》里,这种力量不仅有,而且深。悬浮又实存于文本中的“观心宝石”,对人物来说是对灵魂的探照、质询和拷问。而对阅读来说,是对世界的把握和对人心的善念。

有多少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写着写着就忘情于自我放逐的傲慢、沉坠于对世间万象的展示,甚至深陷于对恶念恶行的揭示。而在这部小说中,“观心宝石”的存在犹如内在的导航仪、透视镜,也是价值观的验证码。这批人在凌乱时代的成长、在复杂社会的历练等情状,小说不仅没有回避,还对扭曲现象诚恳体恤的细写,让人深思这一切因何而至,而宝石的意义就在于它给出了另一种深切的映射和印证。肯领自身之“罪”,才有可能得到心灵救赎;勇识自身之“病”,才有可能获取生命安顿。

长篇小说讲故事的方式各有千秋,但内容大抵离不开人的选择与命运的矛盾,讲述方式的高下又直接影响内容的可信度和文本的成色。我们看过太多以步步逼近的情节、始终趋前的姿态、一直紧张的节奏为特色的小说,在“我”的强势选择中,命运尽管波折但一定是或一路下滑或逆袭上扬,回过头来衡量人物的所行之路时,会沮丧地发现人们生活、奋斗了那么久,只不过是比“狠”、比“坏”、比心机、比捞取。《观心宝石》虽仍关涉选择和抗争,却不同于那些一味书写在较量与竞争中玉石俱焚的作品。自我与社会、困境与前途、理想与利益、真情与欲望,这些元素在足够的正视和尊重的写实基础上,为主人公林阳选取了既懂得不进则退又深知以退为进的人生大道,不能不說这也是作家的大智慧。小说写出了历经艰难的除尘掸灰、痛苦的清淤排障,直至登高望远,如雨后之虹昭示着大境清新,如雪原之花象征着生命纯贞。

相对于小说的“将真事隐去”和诗歌的“诗无达诂”,散文是最能看出作家性情和文学功底的文体。就散文的书写内容而言,不管是记人叙事也好,还是状物写景也罢,一篇散文,往往传达给读者的是作家真实的现实感受和情感体验。优秀的散文都是“有感而发”、行止随意、从容而为,悉数中国文学长河中那些闪烁着光辉的散文篇章,莫不感受到作家风轻云淡、挥洒自如的从容与优雅。这种从容与优雅源自于作家与之所处世界的一种密约:心无旁骛地专注有情有义的日常生活,用笔倾情记录“相看两不厌”的烟火世界。

刘琼的散文集《通往查济的路上》所书写的对象是“散乱”的,里面有游记、日常叙事、人物速写、现实思考、读书心得、艺术感悟等,这种“大杂烩”的呈现,让我们看到了广义“散文”的包罗万象和丰富多彩。其中的作品长则五六千字,短则千八百字,参差错落,顾盼有情,体现出作者创作时随心所欲、不拘一格的消散心境。

《也是一件小事》记录了作者一次出差回来,在小区干活的农民工主动帮她将沉重的行李拿到楼上的事,农民工的善良与她起初心理上“担心被讹”的“小九九”之间形成强大的张力,作者坦言:“我的这种小知识分子的谨小慎微和自作聪明”同时也“遭到了一次严厉的嘲笑”。农民工的形象与品格的反差让我这个看起来有文化有教养的城里人还在盘算怎么对付这些来城里谋生的民工,还在怀疑他们的善良而“脸红”。作者进一步借助鲁迅对小知识分子衣袍下藏着的“小”来批判自己,言辞犀利,毫不留情,字里行间弥漫着深刻的反省、内疚、自责、悔悟。在结尾,当作者说“也许,有此感受的,还不止我一个人吧”时,正好回应了卢梭在《忏悔录》中的那句话:“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一样,请您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在《通往查济的路上》中,刘琼表现出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情感和温暖情义。《给雪村的礼物》,笔法洗练如罗雪村先生的画作,寥寥几笔就勾勒出罗雪村先生的谦谦君子形象。《向努力站立的你致敬》行文收敛稳健,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叫蒋萌的青年的励志故事。蒋萌坐在轮椅上,精神却站着,正如有人评论史铁生时说:“他用他的苦难提高了读者的精神海拔。”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对坚强生命的颂歌,也体现出作者的悲悯情怀,为读者树立起一个生动的励志榜样。

刘琼记述人物有一个策略:不求面面俱到、泛泛而论,但求抓住一个点,然后耐心渲染,最后形成“管中窥豹”的效果。文章篇幅不长,但情感饱满,朴拙的语言背后体现着作者对散文精致书写的审美追求。其实,在刘琼的散文名篇《姨妈》中,我们就能察觉到作者娴熟的人物“速写”技能。“姨妈”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作者将姨妈置于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中去审视,从而让我们在“姨妈”的身身体会到一代人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这一代人的命运遭际来自现实,直指历史。

《通往查济的路上》还收录了刘琼的一部分游记。优秀的游记作品并不仅仅是“记”游,就中国的游记文学传统而言,作家往往将自然景致的感导向自我身世的感思,托物言志是惯常手法。王安石说:“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是为了“求思之深”。“求思”、“抒志”的功利思想,不仅没有让中国的游记散文枯燥乏味,反而因为不同人的情思寄托变得绚烂多姿、意味深长。

刘琼的游记作品继承了中国游记的创作传统又别开生面、独具风格。在写法上,述古源史,注重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民俗文化的整合,再将自己的情感体验巧妙植入其中,从而显示出文质彬彬的艺术效果。在《通往查济的路上》中,作者从明代冯儒彦的一首诗起笔,交代了查济的地理位置,然后在儿歌式的问答中让我们领略到查济“寺庙亭台塔影下,小桥流水杏花天”的秀丽与素雅。笔随车行,在通往查济的路上,作者重在“路上”,不在“查济”,从“学堂”“桃花源”“徽州驴”“地名”“文人痴梦”五个方面展现出徽州人的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这五个方面,其实是通往查济路上的五个“岔口”。“学堂”的繁盛标志着徽州人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桃花源是陶渊明的乌托邦,但在刘琼的笔下,各种兵燹祸事在这里轮番上演,理想与现实的倒错,让我们的“桃源梦”染上了一层悲壮色彩,正如作者说:“连天战火眼前,长不出鲜美芳草。”“徽州驴”以“驴”喻人,我们看到了胡适的温良、中庸,陈独秀的倔强、任性,陶行知般的坚韧、高蹈等,在斑驳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凭借“徽州驴”的脾性负重前行的身影,

终究定格为徽州文化的一道靓丽风景。“地名”和“文人痴梦”谈的都是地名文化。地名本是文化,每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都是解读一个地方的文化密码。徽州的地名包括“徽州”在内,用诗意的符号凝聚着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在“地名”中,刘琼发挥“考据源流、辨章学术”的优势,书写出了徽州地名的诗意盎然和源远流长。当文字的旅程到达查济时,读者却还沉浸在对徽州的“痴梦”中,这样“顾左右而言他”的写法不仅没有偏离主题,反而从侧面迂回、含蓄地展示出查济之美。其他游记如《恋之叮礼帆》《泗水流,静静流》《维也纳、墓地和美》等,语言秀婉,文笔灵巧,写法与《通往查济的路上》异曲同工,但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让这些作品又展示出不同的审美效果。

刘琼是典型的学者作家。《通往查济的路上》中,有一部分作品是她作为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的介入,这些作品情理俱佳,显示了一个作家的济世情怀和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就写法而言,作者往往从生活现象出发,然后自然而然“滑”入主题并对其进行冷静思考。这些思考独到且深刻,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如《从扎耳洞开始》,从扎耳洞这个“女子专属”行为开始,谈论了文学史中的女性写作和男性世界中的女性形象。《新媒体时代的春节文化》中,作者认为“关于节日文化,要看到其对于一个民族精神和心理建设的重要意义。春节文化的现代化,最关键还要在厘清春节文化的仪式本体、情感内核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形式加大对春节的文化价值的传播,强化对春节的文化感知。”“资本和文艺的关系”,作者疑问:“我们是不是要把文艺生产都放在资本的盘子或市场的盘子里?”在《谁是遗产保护背后的推手》中,作者的思考是:“对于21世纪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而言,以全媒体为特征的大众传播是重要构件,清醒、准确、全面地认识大众传播的特性和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探索科学、有效、可行的保护模式,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再如《“研讨会”怎么开》《学者正论为摘客》是谁斩断了“情怀”的翅膀》《历史的》是首要标准吗?》等,光看这些题目,就能体会到一个知识分子冷静面对社会的态度和勇气。

最后,《通往查济的路上》让我们重新看到了散文集“百花齐放”的应有模样。刘琼的散文在情、景、事、理达成的平衡中,再一次显示出这种文体的现实阐释力和存在的必要性。